

新中國時期（1950-1970）《詩經》研究現象探討

呂珍玉*

提要

新中國時期（1950-1970）在毛澤東中國式的馬列思維下，政治干擾文學藝術，《詩經》研究被過度詮釋為一部宣揚階級鬥爭的工具，幾無成果可言，學界對此階段的《詩經》研究多以不堪回首帶過。但就《詩經》學術史而言，觀察其形成背景、呈現現象、探討政治以及思想如何制約學術、描述或評論《詩經》在該階段留下的印記或有必要。本文從毛澤東與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下的《詩經》研究現象、庸俗社會學對《詩經》研究的扭曲等三個面向，考察毛澤東式的馬列思想對當時政治、社會與思維的全面性影響；在學術群體熱烈論辯中國古代社會制度，歷史唯物史觀方法論盛行，國風民歌說，強調人民性與階級對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瘋狂破四舊的背景下，《詩經》研究呈現怎樣的面貌？在庸俗社會學硬套西方歷史發展框架、研究方法方向單一、意識形態凌駕學術、漠視文學與文化的學術氛圍下，《詩經》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怪現象。所幸 80 年代撥亂反正以後，逐漸走出陰霾，不僅出版書籍、論文量增，研究視角也更加多元。

關鍵詞：新中國、詩經、馬克思、階級鬥爭、唯物史觀

*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Study on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Period of New China (1950-1970)

Chen-yu Lu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New China (1950-1970), upon Chinese Marxism-Leninism of Mao Zedong, the politics interfered in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was interpreted as the tool to promote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findings was insignificant. Academia tends to neglect the studies on *The Book of Songs* at this period. However, regard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the background of formation, phenomenon, study the constraint of politics and thoughts on academia and describe or review the trac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period. According to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o Zedong, Marxism-Leninism and Marxism and sociology of common sense on the twisted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this study probes into overall effect of Marxism-Leninism of Mao Zedong on politics, society and thoughts at the time. When academic groups discussed and debated about Chinese ancient social system,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prevailing, folk songs became national,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class was emphasized and with insane Destruction of Four Old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how was the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Sociology of common sense blindly followed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single. Ideology was superior to academia an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as neglected.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was unprecedentedly unusual. Fortunately, after the modification in 1980s, the books and papers increased and the research vision became more diverse.

Keywords: New China, The Book of Songs, Marx, the class strugg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壹、前言

國共內戰的結果，1949年海峽兩岸分別建立政治、社會制度互相對立的政府，雖然文化傳統相同，但因社會制度不同，因而形成兩岸人民思維上極大的差異。創立哲學詮釋學的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說：

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本文，因為這本文是屬於整個傳統的一部分，而每一時代則是對這整個傳統有一種實際的興趣，並試圖在這傳統中理解自身。當某個本文對解釋者產生興趣時，該本文的真實意義並不依賴於作者及其最初的讀者所表現的偶然性。至少這種意義不是完全從這裏得到的。因為這種意義總是同時由解釋者的歷史處境所規定的，因而也是由整個客觀的歷史進程所規定的。¹

他的見解點出讀者接受與時代的關係，在《詩經》這門學科歷經漢學、宋學、清學之詮釋特點即是印證。接受美學重視讀者的接受參與。然而新中國建立後歷經大躍進（1958-1960）、人民公社（1958-1984）、文化大革命（1966-1976）、撥亂反正改革開放（1978-）等不同階段政治、社會變革，尤其是50-70年代，政治干擾學術研究的情況特別嚴重，以發揚《三百篇》的社會意義為詮釋目的，存在著深刻的馬列社會主義色彩，好長一段時間被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所匡限。檀作文〈20世紀詩經研究史略〉一文將20世紀的《詩經》研究劃分為四大時期，其中第三期的《詩經》研究是以階級分析法和唯物史觀為理論支柱，系統性有所加強，但視角單一，存在模式化偏差。²林祥徵〈二十世紀中國詩經研究述略〉則以為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是引進西方相關學科進行研究為其主要特徵；後五十年是以唯物史觀指導進行為其主要特徵。後五十年第二階段1957—1977年是《詩經》研究的低潮期。³本文主要以檀、林兩氏指出，大約是上世紀50至70年代為觀察範圍。此階段中國經歷著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成為意識形態的主導思想，社會科學界無不自覺的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系統整理各自的學說。

¹ 見〔德〕加達默爾撰，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頁380。

² 檀作文〈20世紀詩經研究史略〉將20世紀的《詩經》研究劃分為四大時期：解放前以《古史辨》派的出現為界，分為前後兩期。解放後文革之前是一個時期，撥亂反正之後又是一個時期。第一期的《詩經》研究，基本上處在今古文經學的影響之下，可視為清代《詩經》學的繼續。第二期是現代《詩經》學的開創時期，現代《詩經》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大體於此期建立。第三期的《詩經》研究，以階級分析法和唯物史觀為理論支柱，系統性有所加強，但視角單一，存在模式化偏差。第四期是一個多元化取向的時期，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取向成為一時的潮流。（文載《天中學刊》第15卷第1期（2000年2月）。）

³ 林祥徵〈二十世紀中國詩經研究述略〉則以為二十世紀前五十年是引進西方相關學科進行研究為其主要特徵；後五十年是以唯物史觀指導進行為其主要特徵。後五十年又可分为三階段：（一）1950年—1956年：詩經研究的普及（二）1957—1977年：《詩經》研究的低潮期。（三）1978—世紀末：詩經研究的繁盛期。（文載《泰安師專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年3月）。）

何謂馬克思主義？1974 年大英百科全書說：

馬克思主義一詞，用法不一。其最主要的含義是指卡爾·馬克斯的思想，從廣義上說有時還包括其朋友及其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尤其是 1914 年以前還存在著為各種社會主義運動所理解和實踐的馬克斯主義。然後由列寧制定，斯大林所完善的蘇聯馬克斯主義……又稱馬克斯列寧主義……還有毛澤東的中國式馬克斯列寧主義。⁴

宋萌榮《當代視閥下的馬克斯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對馬克斯主義提出扼要的定義：

馬克斯主義是馬克斯、恩格斯의思想和觀點的體系；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工人階級乃至人類解放的學說，是包括科學世界觀、歷史觀、自然觀的完整理論體系；它是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⁵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中國式的馬克斯列寧主義成為最高指導方針，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成為所有學術文藝研究奉行的準則。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思維觀點下，《詩經》研究出現前所未見的怪論，被過度詮釋為一部宣揚階級鬥爭的工具。對於這段創巨痛深的《詩經》研究，大陸學者多不願再觸及，僅見一些零散論述⁶；近年來臺灣學界開始關注此議題⁷，本文承繼這些學者之後，期望對該階段解《詩》的時代背景、思維觀點、引經為用、呈現現象，加以剖析探討。雖然該階段的《詩經》研究屬於停滯期，幾無成果可言⁸，但就《詩經》學術史而言，觀察其形成背景、呈現現象、探討政治以及思想如何制約學術、描述或評論《詩經》在該階段留下的印記或有必要。

貳、毛澤東與馬列主義

⁴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馬克斯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1985 年），頁 389。

⁵ 見宋萌榮：《當代視閥下的馬克斯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

⁶ 較為集中討論的有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中第五章〈新中國前十七年詩經研究的得失〉、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中第四章〈極左思潮干擾下的詩經研究〉。

⁷ 例如陳水福〈馬克思主義對詩經研究的影響〉，（《經學研究論叢》第 16 輯）、林慶彰教授提出「馬克思主義是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時期經典研究最重要的課題，這個問題有待深入的研究。」（見〈民國以來經學研究〉網址 <http://classic.litphil.sincia.edu.tw/classic/?page-id=326>）史甄陶〈陳子展詩經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一次學術會議論文，史氏後來改以〈陳子展研究詩經法述評〉為題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四期，民國 101 年 9 月。）邱惠芬〈唯物史觀下的詩經研究〉，（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二次學術會議論文）等學者紛紛受其影響，撰文於研討會發表。

⁸ 撰者根據寇淑慧《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所收資料，統計 50-70 年代出版專書 29 部，報章及期刊論文 370 篇，這樣的數量實在不夠，其中又以見於報章文章為多，而且集中於社會性強的〈伐檀〉、〈碩鼠〉等幾篇的討論；專書則以張西堂《詩經六論》、錢鍾書《管錘篇》、于省吾《詩經新證》、黃焯《詩疏評議》等幾部能擺脫政治框架，獨樹一格，較有學術價值。

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當時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相當黑暗混亂，李大釗極力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毛澤東也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⁹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真正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加上中國剛好發生五四運動，工農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造成中國政治、社會極大的變化。由俄國傳入的馬列主義，雖然受到胡適主張的「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¹⁰，以及無政府主義的論戰，最終還是在十月革命之後被介紹到中國來。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當時許多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的作家、學者都接受馬克思主義，並用它的觀點和方法觀察社會問題，指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於是馬克思主義立即和新文化運動結合起來，並影響新文化運動，成為宣傳馬列主義的巨流，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好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21年一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綱領：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9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¹¹可見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將馬列主義中國化，產生毛澤東思想。毛澤東1920年第二次到北平，初次讀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如〈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時，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偏激主張，於他的反叛思想有甚多可資運用的地方，於是多方加以探索。廣泛吸收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斯大林的殖民地革命思想。他的共產主義思想，是從讀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開始，1926年3月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從經濟觀點出發將中國社會結構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等，他對社會階級的分析，目的在便於煽動階級鬥爭，他的世界觀是從唯心論到唯物論。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社會、經濟發展藍圖，發揚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主張無產階級為革命之領導。新中國成立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在〈共同綱領〉總綱第一條即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思想被崇奉為一座無比豐富的寶庫，是人們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毛澤東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從此主導政治、社會甚至是學術研究與文藝理論。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

⁹ 見〈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著作選集甲種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283。

¹⁰ 語見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新青年》「每週評論」第28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

¹¹ 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9年4月14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總綱。

學》：

新中國的學術文化從開始就有兩個起決定作用的特點：首先，是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理論，寫進了黨章和憲法，違背乃至偏離這個理論是絕對不允許的。……¹²

張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新文藝（上）〉說：

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指出文藝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包括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文藝工作者要「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¹³

毛澤東文學思想的核心是政治效用，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¹⁴、〈新民主主義論〉¹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¹⁶等論著中都有這樣的體現。他並發起一連串的文藝、文化批判運動——1942年領導延安的文藝整風，五、六十年代，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胡適的政治、哲學、文學思想運動、發起對在文學思想上與〈講話〉存在分歧的「胡風集團」的攻擊，發起1956-1957年間文學界「異端」力量的攻擊，60年代，甚至發動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他不承認具有獨立特性和地位的文學，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政治路線，並據此制定文藝路線、政策，從5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大陸普遍遵循的準則。他主張「文藝為無產階級、為工農兵服務」，反對資產階級重視人性、人情，將藝術第一、技巧第一或思想性與藝術性並重視為謬論。於是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群眾、作家的思想改造這些議題掩蓋了文藝審美，《詩經》也在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¹⁷政治氛圍下，被荒謬的誤讀好長一段時間。

參、馬克思主義下的《詩經》研究現象

民國以來高喊救中國，向西方學習已然成為時代思潮。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主張用社會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重新認識《詩經》，他說《詩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

¹² 見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 年），頁 166

¹³ 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 6 期總 186 期（2011 年 11 月）。

¹⁴ 本文為毛澤東 1938 年 10 月 14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第六次全體會議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一部份。

¹⁵ 本文為毛澤東 1940 年 1 月 9 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演講，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於 1940 年 2 月 15 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 2 月 20 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 98、99 期合刊登載，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¹⁶ 本文為毛澤東 1942 年 5 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包括 5 月 2 日所作引言和 5 月 23 日所作結論兩部份，1943 年 10 月 19 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發表，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¹⁷ 見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 年 2 月 28 日。

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¹⁸古史辨學者亦對《詩經》展開熱鬧的討論，以民歌說反對《詩序》，企圖將《詩經》拉下經的地位。聞一多則引用人類學及佛洛伊德性心理學，開啟《詩經》研究的新視角，《詩經》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魯迅¹⁹、郭沫若、高亨、孫作雲、陳子展、劉大杰、詹安泰²⁰等學者力圖引用馬克思的觀點與方法來研究《詩經》。《中國文學史》教材多半把風詩分為反剝削、反壓迫的詩，關於戀愛和婚姻的詩，關於勞動的詩，反映貴族階級生活的詩。²¹

大體上說民國以來的學術研究空間是寬廣的，既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亦有對新文化運動的攻擊。既引進西方民主自由思想、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亦有人鼓吹宣統復辟和創立孔教。五四以後，歷經八年抗戰、四年國共內戰的沉息，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歷經十餘年的紛亂，但不久旋即又以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為最高思想指標，學術、文藝受到壓抑，《詩經》詮釋也隨之充斥著庸俗社會學思維。²²以下試從五個實不可分的面向考察此階段的《詩經》研究現象：

¹⁸ 見〈談談詩經〉，收入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三冊（香港：太平書局，1941年），頁577。

¹⁹ 夏傳才說魯迅是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評論《詩經》的先驅者，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詩經》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見《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年11月初版二刷，頁259。）但趙制陽《詩經名著評介·魯迅論詩經評介》則以為夏氏的話，如向魯迅論《詩經》的文章裏找，實在是找不到的。夏教授之所以這樣說，我們可以理解，幾十年來，大陸學術界所塑造的意識形態是：凡有研究，必須戴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以示思想純正，有本有源。不然，即會遭到排斥，將無立足餘地。魯迅以文章名世，原不靠馬克思主義。但在大陸學者看來，總是一件憾事。所以夏教授才有此說。（見《詩經名著評介》（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年），頁246。）

²⁰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說：「西周是奴隸制社會的繼續和發展。周朝為了加強政治權力，強化對奴隸大眾的統治和榨取，在政治上建立了較為嚴密的組織，並確立了維護階級秩序的宗法制度。（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頁32。）詹安泰發表建國以後第一篇力圖以馬克斯主義觀點方法研究《詩經》的學術論文〈詩經裏所表現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見《人民文學》1953年，7、8期合刊。郭沫若《奴隸時代》、高亨《詩經今注》、〈詩經引論〉、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陳子展《詩經直解》書中或多或少都具有社會主義觀點，下文將述及，不遑一一說明。

²¹ 例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分為反映當代社會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勞動與愛情的歌唱、被壓迫階級困苦生活的描寫、對黑暗政治的諷刺與批評、對神權的懷疑與反抗。褚斌杰《中國文學史綱要》分為反剝削反壓迫的詩篇、反映徭役、兵役痛苦的詩篇、反映愛情婚姻問題的詩篇、反映勞動生活和愛情思想的詩篇。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亦分諷刺統治階級荒淫無恥一類，說〈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鮮明的畫面，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處境，表達了他們對剝削、壓迫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國最早的寫實主義詩篇。

²² 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分成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一.1957-1958年：極「左」思潮在《詩經》研究中初露端倪；二.1958-1965年：極「左」思潮影響和干擾下的《詩經》研究形成了固定模式；三.1966-70年代：極「左」思潮在《詩經》研究中的惡性發展和《詩經》研究學術獨立性的喪失。（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26-127。）

一、社會制度的論辯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是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美國學者德里克指出 1927 年的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培養和造就一群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社群，他們遵循著唯物史觀的研究路徑，全面且深入地針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等相關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努力構建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學術體系。²³ 上世紀 20 年代末期，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首開學界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引爆發生一場關於中國社會史性質的大論戰，論戰的焦點是中國有無奴隸社會？以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是否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對此議題展開廣泛的討論。由於《詩經》跨越時間長達 500 年，作者多未留下姓名，當時的社會現象、本質如何？這是應先確立的。於是《詩經》中的〈七月〉〈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噫嘻〉、〈臣工〉等記載當時農業生產活動詩篇，〈北風〉、〈十畝之間〉、〈碩鼠〉、〈伐檀〉、〈大東〉等社會生活詩篇，成為提供確定周代社會性質的直接材料，也是斷定古史分期的重要資料。以下略述長期以來重要學者的論點：

（一）郭沫若（1892-1978）——西周是奴隸社會

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聲明是繼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觀點和方法，廣泛的運用《詩經》、《尚書》中豐富的史料，來分析殷周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是首部應用馬克思唯物史觀研究古代社會之作。他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說：「大抵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公社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地進入了封建時代。」他把周代的奴隸制視同希臘、羅馬的奴隸制。

《奴隸制時代》（1952），將奴隸制的下限斷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即公元前 475 年。²⁴ 他說商代已有種族奴隸，周征服了商，把殷民降為種族奴隸。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是殷之遺民。「懷姓九宗」，則是屬於殷的種族奴隸，但以後都成了周的種族奴隸了。此外他又舉《左傳・隱公六年》（717B.C.）「九宗五正」說周的統治進一步發展了中國的奴隸制，把更多的種族加以奴隸化，《詩經・大東》一詩就是這種反映。²⁵ 由此看來，他主張周代有大規模以其他種族為奴隸的現象。

²³ 參〔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賀凱譯：《1919-1937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²⁴ 《奴隸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頁 30 都提到。

²⁵ 參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關於中國古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84。

在〈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又說：

總括地說，西周是奴隸社會的見解，我始終是毫無改變。井田制是存在過的，但當如《周官·遂人》所述的十進位的百分田法，而不如孟子所說的八家共井，只因規劃劃分有類「井」字，故名之為井田而已。土田的分割在西周固已有之，但和彝族社會也有土田分割的事實一樣，決不能認為封建制。農業奴隸比較自由，可能「宅爾宅，田爾田」，有家有室，有一定的耕作地面，但只有享受權，而非有私有權。在形式上看來雖然頗類似農奴乃至自由民，但奴隸的本質沒有變革。周代金文中多「錫臣」之例，分明以「家」為單位，不僅把「臣」的身份表示得很清楚，就連他家人的身分都表示得很清楚，那是無法解釋為農奴或自由民的。有些朋友又把周代農事詩解為地主生活的紀錄，把孟子式的井田制解為莊園的雛型，那更完全是過於自由的純粹的臆想了。²⁶

他反駁周代是農奴制，在《奴隸制時代·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一文高度讚許斯大林對奴隸與農奴的區分說：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²⁷

他認為奴、婢、隸、僕、童、妾是從事於家內的賤役，而臣、民、氓、宰則多從事於生產。後者的數目比前者要占絕對的多數，而且在社會上的地位比前者更為低賤。西周的生產事業，無論農工商賈，都是由民、氓所經營著的。少數奴隸所有者的貴族被多數家內奴隸簇擁著而君臨在最大多數的生產奴隸上面，這是和希臘、羅馬毫無二致的。²⁸

郭沫若對周代社會性質的論辯使用的材料相當多，除了《詩經》、《尚書》、《左傳》、《史記》等典籍外，還舉周金十二器，商、周以來殉葬制度，以證周代是奴隸社會。由於他的論點不周密，引爆一場歷時長久，參與人數眾多，對於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論戰。²⁹

²⁶ 原載《中原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收入《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²⁷ 見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3。

²⁸ 參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駁實庵字說》，頁212。

²⁹ 美國學者德里克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各篇論文是分別撰作的，並不構成一個內在統一的系統論述。郭沫若也並未試圖去對其關於奴隸社會的不同的特徵之間的相對重要性作出評估。無論這種疏忽是有意還是無意，缺乏對奴隸社會清晰的定義，大大降低了其論述的內在一致性。而且，他也沒有能夠說明，有哪些他所認為的奴隸社會的普世性的先決條件在周朝已經實現了。郭沫若對關鍵問題的論述常常自相矛盾，他只有通過對偶然性證據的反覆地贅述，才能為他的周代社會提供一個大致的說明。對郭沫若而言最為尷尬的是，作為一個馬克思者，在總體上，他並未能從周代社會的制度特徵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中，找到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的直接證據。郭的論敵們很快就抓住了他論述中的這些弱點。」（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頁158。）德里克這段話十分真切，能針對郭說論辯的總體問題。另外德里克在書中第六章〈中國歷史

（二）范文瀾（1893-1969）——西周是封建社會

《中國通史簡編》（1942）第三章〈封建制度開始時代—西周〉中說西周是封建制度開始時代，〈七月〉一詩所寫的生活，顯然是奴隸生活。在《歷史論文選集·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說：「西周已開始封建社會，當然氏族社會、奴隸社會的殘餘保留還是很多。」³⁰

（三）鄧初民（1889-1981）——周代是封建社會，但存在夏商奴隸社會的遺跡

《中國社會史教程》（1942）將中國社會分為：

原始共產社會—自太古至夏初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西周至清末鴉片戰爭

半封建社會—清末鴉片戰爭→現在認為西周不能算是奴隸社會，但一定還存在夏商奴隸社會的殘存或遺跡。³¹

（四）呂振羽（1900-1980）——西周是領主封建社會

《中國社會史綱》（1949）他從殷商遺物和甲骨文字中，揭開殷商社會的奧密，首倡殷商為奴隸社會和青銅器時代，繼郭沫若之後，把中國奴隸社會研究推進了一步。他對西周社會的研究，破除舊觀念上的封建陳說，從科學意義上分析西周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諸形態，提出西周是中國初期封建社會，即領主封建社會的理論。他還提出，西周至春秋戰國初期封建制是處於不平衡發展狀態，奴隸制的消失，領主制的擴張，地主制的出現，都經過了一個錯綜複雜的交叉過程。

（五）童書業（1908-1968）——從夏代起到春秋末是原始奴隸制的時期

〈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1955年1期《文史哲》）從中國古代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性質、戰國秦漢時代的古典經濟形態兩方面探究，提出：從夏代起（至少從殷代起）到春秋末是原始奴隸制的時期，從戰國起到漢末是發展奴隸制的時期，魏晉時代才正式轉入封建社會。³²

（六）高亨（1900-1986）——西周是領主封建社會，春秋戰國是由領主封建社會向地主封建社會過渡，以及地主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

〈周代地租制度考〉（1956《文史哲》第10期）通過分析《詩經》、《左傳》、《國語》、《孟子》等書有關的記載，認為西周主要的地租方式是「助」、「藉」，也就是勞役地租，

分期〉列有陳邦國等34人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對中國歷史分期看法的總表，並對他們的論述加以評述介。

³⁰ 《中國通史簡編》（上海：新知書店，1949年）；《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79年）。

³¹ 見鄧初民：《中國社會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1942年），自序及頁130。

³² 童氏的意見引來楊向奎、黃雲眉、韓連琪、盧南喬、鄭鶴聲、王遨如、張惟華、王重榮等人廣泛討論商榷。

從而證明西周是領主封建社會。其次，通過分析《左傳》、《國語》、《管子》、《商君書》、《史記》、《漢書》等書，認為春秋時代齊、晉、楚、魯、鄭五國，以及戰國時代的魏、秦兩國都先後實行了實物地租制度，證明春秋戰國是由領主封建社會向地主封建社會過渡，以及地主封建社會形成的時期。

（七）孫作雲（1912-1978）——類似歐洲封建農奴制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1966）是一部將《詩經》和周代歷史、社會民俗結合起來的專著，他認為文王之世周人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說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此外〈從詩經中所見的西周封建社會〉一文，從生產關係考察封建土地所有制、西周農業生產者主要是農奴、統治階級是各級封建領主、農奴對領主的鬥爭等議題。他雖然不贊成西周是奴隸社會，但仍相信某些詩篇呈現庶人、婦女毫無人身保障權，並聯繫到歐洲中世紀領主對於農奴婦女的「初夜權」，說《詩·七月》描寫的現象與之「很有點兒相像」³³

（八）何茲全（1911-2011）——《詩經》似乎沒有反映奴隸生活的詩篇，並提出魏晉封建說

《中國古代社會》（1991），比較細緻的從詩篇分析，考察作者的身分。他分析〈擊鼓〉、〈君子于役〉、〈陟岵〉三詩說：出征服役的人，是一個小家庭的成員，給他送行的是家人，他懷念的和懷念他的也都是小家庭的人。如果是個農民，他已是一個獨立的小農了。此外他還分析多首詩，說明當時並非奴隸社會：

〈鵲羽〉寫的是小農服役出征後不能從事農業。沒有糧食，父母靠什麼生活。〈甫田〉寫的是，因為男子服役遠征，大田因無人耕種，大面積荒蕪了。……這裏所寫的都是些個體小農。

〈七月〉寫了一家農戶一年到頭的生活這裏寫的像是一戶依附民，但也難肯定地說。

〈碩鼠〉的農民，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但他們是依附民還是佃農抑是雇農，從詩文詩意裏都是難肯定的。他把他的主人比做鼠，仇恨地要離開。但這走開，是逃亡呢，還是自由的離開？因為不能肯定，也就不能肯定他的身分。我比較傾向他們是雇佣關係，可以自由離開。

〈黃鳥〉寫的又是一種情況。此人好像由一國（一個城邑）到了另一國，離開了自己

33 詳參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98。檀作文〈20世紀詩經研究史略〉說孫作雲的《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採用郭沫若式的歷史取向，以《詩經》為材料，探討西周的社會性質，不同於郭沫若的是他持「西周封建說」；在具體研究，他又對聞一多的民俗文化學視角多有借鑒。他的研究兼顧文學、史學、民俗學和考古學各個方面，見解多新穎而有據。但他在描述西周社會性質時，用馬克思關於歐洲近封建農奴制的論述作參照系，有簡單類比的嫌疑。文見《天中學刊》第15卷1期（2000年2月）。

的家族到另一個家族的地區去。他是農民……這是一戶去外地作佃農、雇農的小農吧？還是婚嫁，去作贅婿？……

《詩經》裏似乎沒有反映奴隸生活活動的詩篇。³⁴

他除了否定西周是奴隸社會外，還獨樹一幟的提出魏晉封建說。

（九）楊寬（1914-2005）——西周奴隸有三類

楊寬《西周史》（1999）證以西周銅器銘文，將西周的奴隸分為三類³⁵：

（1）單身奴隸，稱為「人鬲」、「鬲」或「訊」，以「夫」或「人」計數，是戰爭中的俘虜。

（2）婚配成家的奴隸，叫做「臣」，以「家」計數。

（3）把整個氏族或部族作為奴隸。

他說西周時上述三類奴隸的數量相當大，主要來自掠奪和征服戰爭，在交換中價格很低廉。

以上九位學者的論證，並不統一，有說西周是奴隸社會，有說西周是封建社會，有說西周是領主封建社會，有說西周是封建社會但有夏商奴隸社會的遺跡，也有說《詩經》沒有反映奴隸生活的詩篇。周代有奴隸，但未必就是奴隸社會，由於對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界定與劃分不清，大規模的以人殉葬，是否就是奴隸社會？《詩經》到底有無反映奴隸生活的詩篇？奴隸與奴隸主間的關係如何？《詩經》能否提供這樣的研究材料？在當時都曾經有過激烈的辯論。雖然所見不同，學者們從唯物史觀觀點，對中國古代社會形貌加以描繪，提供史學、文學、思想等學術研究，不同於以往的視野。就《詩經》研究而言，即便是持封建社會說的學者，也普遍採用領主、農奴對立態度說《詩》，因此古代社會制度的論辯，不論是主張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中的階級劃分，在當時以階級鬥爭、消滅階級的政治口號下，都被簡單、粗糙援引為政治、社會改造進步的歷史法則。

在上世紀 50-70 年代特殊環境下，為取法周代社會的階級鬥爭，當時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即暫將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的轉化定在春秋戰國時代。³⁶ 西周的奴隸社會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階級矛盾的基礎上，奴隸主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及其他生產資料，還占有勞動奴隸，最大的奴隸主就是周天子。學者根據《周書·多士》、《周書·多方》的記載說周代的奴隸是沒有人身自由和生活保障的³⁷，不但隨時隨地都在受奴隸主貴族的剝削壓迫，而且

³⁴ 見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2-65。

³⁵ 見楊寬：《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71-274。

³⁶ 夏傳才說郭沫若的說法受到許多學者贊成，並深入研究，在史學界形成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個有力學派。多年以來，許多歷史教材都採用這個學說，對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有廣泛的影響。見《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頁302。

³⁷ 〈多士〉：「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意為：「你們若不謹慎供職，你

還隨時會遭到屠殺和買賣的厄運，奴隸主對奴隸擁有一切支配的權利。在這樣的思維意識之下〈伐檀〉、〈碩鼠〉、〈黃鳥〉、〈何草不黃〉、〈漸漸之石〉、〈鴛羽〉、〈采芣〉、〈杕杜〉……，甚至多數詩篇都可以解釋為奴隸主無情壓迫奴隸，《詩經》反映民生疾苦，人民對政治社會的不滿，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當時即便是許多《詩經》研究名家都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解詩，未經嚴謹論證就說《詩經》反映周代的奴隸生活和階級鬥爭。時過境遷，或許可以不避諱的舉出其中三位為例：

（一）陳子展（1898-1990）

《詩經直解》（作者晚年才出版，本書在 30 年代《詩經語譯》，50 年代《國風選譯》、《雅頌選譯》的基礎下，歷經 15 年完成），此書深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影響，不僅常引用，還常印證郭說。雖然陳允吉、史甄陶等學者對該書持有較多正面的意見³⁸，但書中仍難免粗糙的以奴隸社會階級鬥爭觀點來解詩。例如：他從驅除害獸儀式觀點，解釋〈騶虞〉說：「此乃大奴隸主在政治上欺騙廣大農業奴隸之形式主義一套伎倆，與親耕親蠶之禮，迎貓祭虎八蠟之戲等耳。」³⁹〈騶虞〉一詩，從表層文義上看係讚美騶虞善於養獸驅獸，以供國君射獵。陳氏從朝政儀式，階級對立觀點，迂曲解釋其義。他讀〈中谷有蓷〉、〈谷風〉、〈氓〉等棄婦詩說：「愚見、在奴隸制社會的底層婦女實為奴隸之奴隸，有被夫家男權霸賣殺戮之虞，恐無男子肯為鳴其不平者也。」純從奴隸社會的階級形態，臆測當時婦女的命運。他讀〈汾沮洳〉說：

今按：〈汾沮洳〉，言采莫、采桑、采蕢一類之勞動人民具有美材，殊異於公路、公行、公族一類之貴族世祿子弟。此反映由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制社會，奴隸要求解放之詩。《墨子·尚賢篇》謂「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貴賤無常，對立面可以相互轉化，亦正反映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大變革之思潮。詩義自明，《序》說與詩義不合。……」⁴⁰

們不僅不能保有你們的領地，我還要將天的懲罰加在你們身上。」這段話是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殷商眾士必須遷都成周之邑。〈多方〉：「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意為：「如果你們敢違背我下達的命令，我就要大大地懲治你們。」這段話是周公代成王以天命大義告誡眾諸侯國君的告辭。把它和奴隸沒人身自由扯在一起，是這階段泛濫延伸經典與奴隸制度連結的普遍現象。

³⁸ 陳允吉〈陳子展教授與詩經研究〉肯定陳子展博覽群籍，廣泛接觸各方面的知識，以了解古代社會，將探索擴展到自然科學領域，敢於擺脫傳統經師訓解，重視三家詩的優點，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研究《詩經》。（文載《復旦學報》1980 年 5 期）。史甄陶〈陳子展詩經研究述評〉則特別指出陳子展在詩旨的解說上，鮮少以撻伐上古封建社會的剝削問題、鬥爭問題為主要內容，而是藉由古人的研究成果，來說明作者以及被描述者的身分階級，呈現上古社會的各種景況。所以陳子展的《詩經》研究，主要的用意並非在現實政治上改變世界，而是要使現代的人們藉由《詩經》認識中國上古社會。（文載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一次學術會議論文集。後又以〈陳子展研究詩經方法述評〉為題，刊載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四期（2002 年 9 月）。

³⁹ 見陳子展：《詩經直解》（臺北：書林出版社，1992 年），頁 69。

⁴⁰ 同前註，頁 322。

他將此詩說成是奴隸社會進到封建社會，奴隸要求解放，還用《墨子》的辯證法，將詩義上崗為反映社會變動。他讀〈碩鼠〉說：

……〈碩鼠〉刺重斂，實為詩人刺「履畝之稅」，「十取其二」或三取其二而作。二詩雖然緊貼相次，而其作出之年代有先後，詩語有緩急，實因社會驟有變革，剝削顯有輕重也。愚第大較言之。讀者於此可知其時遠在春秋之世，確已萌芽封建剝削之土地課稅法。可知封建制之生產關係已在發展，奴隸制下對農業奴隸勞動上之榨取關係，將由封建制下對佃農勞動上之榨取關係取而代之。維時鐵製農具與牛耕之廣為應用，農業生產力提高，促進經濟上之發展，社會正在大變革中。井田制日見崩潰，而土地私有制代之以興，將由奴隸制轉為封建制矣。……⁴¹

將〈伐檀〉、〈碩鼠〉兩詩加以對照，從其詩篇排列先後、詩語緩急，推論社會驟有變革，剝削有輕重。說〈碩鼠〉詩當時用鐵製農具，生產力提高，實行封建剝削土地課稅法，社會處在大變革中，這樣以唯物史觀，缺乏強而有力證據，即推論當時社會生活情形，是該階段《詩經》研究的普遍現象。

（二）高亨（1900-1986）

高亨在文革時期亦不能倖免的受到一些迫害，後來受到毛澤東保護，得以安身。他的《詩經》論著主要有《詩經選注》（1956）、〈詩經引論〉（1956年《文史哲》5期）、《詩經今注》（1980）⁴²。他在〈孔子是怎樣維護奴隸統治的〉一文中說：「我國西周仍是奴隸社會，春秋時代是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戰國時代是封建社會的初期。」⁴³首先他確立西周為奴隸社會，在〈詩經引論〉揭示研究《詩經》的觀點說：

必須鄭重指出，我們現在是站在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的立場，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和方法來閱讀詩經，考察三百篇的原始意義和社會意義……。

在《詩經今注》他分析〈魏風·碩鼠〉說：「周王東遷以後，奴隸制與農奴制都逐漸破壞，出現了新興地主，他們把土地租給佃農耕種，而收實物地租，對佃農的剝削也殘酷。這首詩正是佃農對地主殘酷剝削的控訴。」⁴⁴據此高亨則認為西周時期奴隸制與農奴制並存，平王東遷後的春秋時期才從領主封建過渡到地主封建社會。

他分析〈葛覃〉說：「這首詩描寫貴族家中的女奴們給貴族割葛、煮葛、織布及告假洗

⁴¹ 同前註，頁 337。

⁴²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臺北里仁書局 1981 年出版本，修訂其中不少奴隸生活的書寫。

⁴³ 發表於《文史哲季刊》1973 年 1 期，總 107 期。

⁴⁴ 見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48。

衣回家等一段生活情況。」又說「師氏」是貴族家中管教僕婦的管家婆。⁴⁵他的說法雖擺脫《詩序》所謂后妃之本，朱熹《詩集傳》說后妃自作，后妃不可能親自從事勞動。不過他說從事割葛等勞動的是僕婦，師氏為管理她的管家婆，臆測詩中人物的階級，亦不可信從。

他分析〈騶虞〉說：「貴族強迫奴隸中的兒童給他牧豬，並派小官監視牧童的勞動，對牧童經常打罵。牧童唱出這首歌。」⁴⁶更見他以分析詩中人物階級為前提，從階級矛盾的特點，來反映的奴隸生活。設想出一位兒童奴隸，又將管理國家獵場的騶虞解說成是監視牧童的小官，還對他經常打罵，無端生出許多文外枝節，從階級對立觀點詮詩已然成為一種模式。

（三）夏傳才（1924-）

夏傳才在《詩經》研究方面著作甚多，擔任過中國詩經學會會長，堪稱《詩經》研究專家。他在 50-70 年代因反革命罪被監禁、流放長達 23 年，備受政治迫害之苦。他在文革期間撰寫的《詩經研究史概要》（1982 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中說：

西周是奴隸制，春秋時期則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到了戰國時期才完全發展為封建制。由於周頌的製作，大約出自史官和太師，周頌中保存了周初奴隸社會興盛時期的階級狀況、政治史實、經濟發展、典章制度、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份確鑿史料，因而具有極重要的歷史價值，是研究我國奴隸社會的可靠詩史。⁴⁷

他主張西周是奴隸社會，又在〈序言〉中提到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詩經》：

對《詩經》研究史進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它的發展過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地繼承一切有益的養料，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是建立當代新《詩經》學的必要條件。⁴⁸

夏氏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將周代視為奴隸社會，以為他所擅長的詩經學史立論，至於個別詩篇的解釋因非該書所重，則無從得知。從他後來撰寫的《二十世紀詩經學》說：

強調學術必須為政治服務；而政治又被解釋為「階級鬥爭」，講政治，就是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可是，在《詩經》中尋找「為階級鬥爭服務」的東西，的確是太少了。⁴⁹

可知夏氏前後觀點的改變，覺今是而昨非，我們更能同情理解當時學者的處境。

⁴⁵ 同前註，頁 3-4。

⁴⁶ 同前註，頁 33。

⁴⁷ 見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頁 12。

⁴⁸ 同前註，頁 2。

⁴⁹ 見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頁 184。

總之確立《詩經》反映奴隸社會生活幾乎是當時解詩的前提，甚至延續很長時間。袁梅《詩經譯注》（1985）說〈周頌·噫嘻〉：「亦服爾耜，十千維耦。」又〈周頌·載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這些奴隸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在奴隸主貴族及其爪牙——田畯的監督鞭笞下日夜勞作不輟。⁵⁰金啟華主編《詩經鑑賞辭典》（1990）於前言說：

《詩經》產生在這一時期，其社會原因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恩格斯說：「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反杜林論》）恩格斯這裏指的是希臘文化，我們可以引用它來說明《詩經》產生的有利條件。周代的燦爛文化，是建築在廣大奴隸的辛勤勞動基礎上的，根源於奴隸們的鬥爭生活。其所在地區，又是所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雅·綿〉），土地條件相當優越。奴隸們擔負生產的重擔，促進生產，這種歷史勞績，首先應該為我們所重視。周滅殷以後，在手工業方面又有更大的進展。今天從地下發掘的大量周代青銅器來看，可以明顯地看出殷代青銅器工業為周人所採用而又有所提高，使周代的農業和手工業有了較大規模的分工，並為文化發達創造了條件。恩格斯又說：「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反杜林論》）西周奴隸社會所形成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使意識形態趨於完整，它在政治措施上推行宗法、等級、分封等制度，按照所謂親疏、尊卑、貴賤等區分來維護統治，除以刑罰來鎮壓奴隸的反抗，又用神道設教，借助於上天、上帝、天命、鬼神等來恐嚇、欺騙人民。⁵¹

金氏拿希臘大規模的奴隸制度來比附周代，肯定奴隸對文化與社會進步的貢獻，這樣的論述仍不脫50-70年代的思維方式。從這些重要學者的言論中，可見新中國時期很長時間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影響，除將《詩經》視為研究奴隸社會的史料外，還有學者不論政治、社會實情，將歐洲或古希臘奴隸制度現象套用於周代。雖然羅馬、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英、法、俄、美等許多國家曾經有過奴隸制度，但是否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大規模的奴隸，並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為強化階級鬥爭，在該階段學者們往往僅憑詩中片段文字，擴大解釋其意涵，缺乏全面而具體的證據。

二、歷史唯物史觀

⁵⁰ 參袁梅：《詩經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11。

⁵¹ 見金啟華等主編：《詩經鑑賞辭典·前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3。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結合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所創立的一種了解歷史、接近歷史的方法或途徑，而非系統性的歷史哲學。對於階級的產生和階級之間的鬥爭，馬克思認為那是歷史變遷的驅動力。他指出人從事生產、開物成務、利用厚生，創造了歷史，但歷史的辯證發展卻因為生產方式的不同，造成經濟基礎的改變以及上層建築的變遷。⁵²20 年代活躍的馬克斯主義著譯者之一施存統對當時盛行的唯物主義作了以下基本的論述：

要講唯物史觀在中國底運用，非先了解唯物史觀不可。唯物史觀底要義，大要如左：

（1）經濟組織（生產及分配方法），是社會組織底基礎，一切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等精神的文化，都是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上部構造」。（2）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同既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只有解決了這個衝突，社會才有進步。社會革命，為的是解決這個衝突，這個衝突解決了，經濟的基礎變動了，於是那些上部建築也都跟著變動了。（3）一切精神的革命（不管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根本原因，都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底衝突。人類因為要解決這個衝突，所以才發生了精神的革命。一切「危險思想」，都不過是經濟事情底反映。（4）一切革命的階級鬥爭（不論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其根本原因，都源於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底衝突。人類越是意識了這個衝突，越努力階級鬥爭，也就越能早一天解決這個衝突。（5）一切問題，只有具備了「物質的條件時」，才能夠解決。⁵³

簡單的說唯物主義主張社會以經濟和物質條件為基礎，只有具備物質條件，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有辯證法、唯物史觀、階級分析。列寧說：「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代名詞。」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何者為先？唯心論者主張精神是世界創造泉源，精神先於物質；唯物論者，主張精神是物質（人的頭腦）的產物，物質先於精神存在。毛澤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先從他的老師楊昌濟學習唯心論，後來走入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⁵⁴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更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偉大的認識工具」⁵⁵馬克斯、恩格斯曾經反覆闡述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

⁵² 見洪謙德：《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臺北：人本自然文化事業公司，2007年），頁418。

⁵³ 見〈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應用〉，《社會主義討論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頁429-430。

⁵⁴ 陳雨蒼《毛澤東思想剖析》說辯證唯物論的主要論點是：（一）認識的對象是客觀世界，它是離開人們的意識而獨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世界。（二）認識客觀世界是憑著人類的認識器官——頭腦來實現的。它是物質發展的最高產物，與其他無生物、有生物不同。（三）客觀世界是可知的。認識，就是客觀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四）認識是發展的，它是由淺入深，由表及裏，是一種運動，沒有終止。（五）認識起源於實踐，它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真理的標準。（陳雨蒼：《毛澤東思想剖析》（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4年），頁91。）

⁵⁵ 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頁5。

理。他們以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唯物史觀論主張從紛紜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中揭示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線索和規律，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是經濟，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一切政治制度，文化現象都是經濟的派生物，其終極根源都在經濟生活，也就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決定社會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十世紀影響中國學術思想的兩件大事，一是受到西方科學方法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受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 20-30 年代社會史論戰。早在五四時代馬克思唯物史觀已傳入中國，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李達等人對它的傳播有一定的貢獻。20-30 年代社會史論戰，唯物史觀更是廣泛影響當時學界。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為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也是唯一正確的科學世界觀，至今仍為思維方式的主流。

由於唯物史觀重視經濟、生產方式等物質生活，因而在《詩經》研究上更為著重對周代社會制度、農業生活、生產方式、社會階級等分析，⁵⁶相對的有些學者開始批評傳統唯心主義解詩。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寫於六十和七十年代外放內蒙時，雖經過八 0 年代初整理、修訂，但仍充滿唯物史觀觀點，從階級與社會觀點研究《詩經》之歷史，他批評唯心主義說：

孔子不懂得社會大變動是社會矛盾激烈發展的反映，不懂得兼併戰爭客觀上正是走向統一的必然過程，也不懂得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人民的暴動正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他的大一統理想正是維護舊秩序的保守幻想。⁵⁷

他批評《詩序》、鄭《箋》、孔《疏》等舊說是站在地主的階級立場，採用封建教化的觀點，主觀唯心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他認為這些舊方法無法知人論世：

有辨證唯物論的認識路線，也有形而上學唯心論的認識路線。前者是從實際出發，掌握大量材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裏，由此及彼，從而全面地認識事物的內部聯繫和規律。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沒有科學研究的正確方法，只是運用形而上學比附方法，或者從階級偏見出發，襲用片面的，不實的材料，那就既不能「知人」也不能「論世」。⁵⁸

袁梅《詩經譯注》認為《詩經》是奴隸制時代的樂歌，研究這些古代的歌謠，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與方法，探索文藝的起源。他引毛澤東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

⁵⁶ 邱惠芬〈唯物史觀下的詩經研究〉（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二次學術會議論文集）對此議題有進一步展開研究，可參。

⁵⁷ 見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頁 12。

⁵⁸ 同前註，頁 63。

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現在，我們研究《詩》，就應該從這些原則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與方法，去正確理解它的內容形式，盡量還給它本來面目，「批判的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同時，堅決剔除一切封建性糟粕。⁵⁹

唯物史觀思維廣泛傳播後，學界趨於從社會生活與生產方式等面向看待《詩經》，雖然所獲結論仍須更多證明，但因此開拓《詩經》的研究視角是不容否認的。對於郭沫若、高亨的《詩經》研究，學界給予一些肯定的評價。例如趙沛霖〈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說：

寫於 1928 年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的著作，本書雖為一部歷史著作，但廣泛涉及到《詩經》，並進行新穎的分析，因而對《詩經》研究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書按照唯物史觀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從新工具的採用、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產業的發展，說明上古時期社會制度的兩次重大變革及其在思想領域引起的激烈的鬥爭。這兩次重大變革：一次是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的推移，一次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 年）在歷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示了《詩經》所反映的時代歷史和社會生活是那樣的廣闊、那樣的豐富、那樣的深入和具體：從當時的生產方式到產業的發展、從社會制度到階級關係的變化、從和平生活到殘酷的戰爭、從政治鬥爭到家庭糾紛，詩人的觸角廣泛的地深入到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所涉及的社會成員看，可以說包括社會各階級和階層，從至尊的天子、公卿大夫和士，直至普通庶民，諸如廣大的農夫、征人、士卒和僕役；就抒發的感情看，從莊嚴神聖的宗教情懷到世俗的喜怒哀樂，抒發的範圍遍及人們內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⁶⁰

趙沛霖高度肯定郭沫若採用唯物史觀研究《詩經》，從工具、生產方式、產業發展探討周代社會制度變革，社會生活，不同的矛盾鬥爭。以為唯物史觀可以看到社會歷史的本質，理出頭緒線索，一改之前人們心中歷史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事件偶然組合。張海峰〈論高亨的詩經研究〉則對高亨的成就予以推崇說：

高亨〈周代地租制度考〉是一篇在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導下，運用傳統考證方式研究中國古代分期的力作。〈周代大武樂考釋〉除考據〈大武〉樂章的具體篇章之外，還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談到〈大武〉的階級性質和社會意義。〈詩經引論〉（二）則依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

⁵⁹ 見袁梅：《詩經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85 年），頁 26-27。

⁶⁰ 文載《齊魯學刊》2004 年第 4 期總 181 期。

觀和反映論，以「西周封建說」為大背景、從經濟基礎、政治局面、社會制度、社會階級、社會矛盾五方面具體分析《詩經》產生的社會根源，並且從階級性和思想性上將詩三百篇分為勞動人民的詩歌和領主階級的詩歌兩大類。……⁶¹

張海峰肯定高亨的周代地租社會說、〈大武〉的階級性質及社會意義⁶²、〈詩經引論〉分析《詩經》產生的社會根源，並分為勞動人民和領主階級兩類詩歌。

唯物與唯心是人類思維的兩個主軸，占有不可偏廢的份量。我們不能完全同意趙沛霖、張海峰對唯物史觀研究《詩經》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尤其是早期應用於《詩經》的研究難以避免的粗疏。甚至趙沛霖在文末即指出：「郭沫若以一般原理代替個別，把馬克思關於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機械地套在中國社會，既不符合馬克思理論的本意，也不符合中國古代歷史的實際。」不久之後他在《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又引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之說，批評郭沫若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把學術研究用於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始作俑者。⁶³林祥徵〈二十世紀詩經研究述略〉也說：

唯物史觀在解釋文學的形成、演變、時代特色、文學活動與社會環境的關係等方面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它屬於外部研究而不是內部研究。百年來的不足正在這裏。德國思維心理學家韋特海默指出：「現在科學盡管立足於歸納，但不喜歡止於歸納，在歸納之外，還要尋找更進一步的理解。」（韋特海默《創造性思維》302頁，林宗基譯，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進一步的理解」的出路之一就是從文本出發，用文學藝術的眼光去體會詩人的創作用心。⁶⁴

林氏從文學的外部、內部研究不可偏廢，指出唯物史觀僅從外部研究，並不能體會作品內部詩人的用心。在當時特殊意識形態下，加上學者初步學習唯物史觀，於應用上流於簡單比附，而且難免淪為宣傳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工具。雖說如此，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新觀念、新

⁶¹ 文載《東岳論叢》第32卷第2期（2011年2月）。

⁶² 《禮記·樂記》：「武樂六成」，孔穎達《正義》：「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高亨認為屬於〈大武〉樂章的六首詩是〈我將〉、〈武〉、〈賚〉、〈般〉、〈酌〉、〈桓〉，這六首頌詞為祭武王時所用的宗廟儀式樂歌，配上武王伐紂過程舞蹈。

⁶³ 詳參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01-102。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本書最主要問題在於沒能正確處理學術研究與政治目的、革命激情與科學態度以及求真與致用之間的關係。關於本書的寫作，郭沫若曾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這就是說，他研究古代社會，不是為歷史而歷史，不是以學問為目的，而另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所謂『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實際上就是現實鬥爭的需要，『清算過往社會』的目的就是要為現實鬥爭服務。『首先…把歷史學作為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和武器來使用和看待，並把它從為個體解放服務升華為為階級解放高度的，是文化戰士郭沫若。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第一次把歷史研究擺到了政治鬥爭的前沿陣地上，使它具有了直接的政治實踐功能。』」（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09）

⁶⁴ 文載《泰安師專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年3月）。

方法，若能充份發揮它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應能得出不同的成果。

三、國風民歌說

民歌的特點是集體性和口頭性，從五四以來〈國風〉民歌說就已成爲主流，胡適〈談談詩經〉就說《詩經》並非古代聖賢垂訓後世的「經書」，而是慢慢收集起來的一部古代歌謠總集。檀作文〈20世紀以來的國風民歌說與非民歌說之爭〉說：

源出於「風詩里巷歌謠說」的「〈國風〉民歌說」，在20世紀長期佔據主導地位。民國時期，是由於當時的主流學者胡適等人的大力倡導；1949年之後，則得益於滲透於各人文社會學科的階級分析方法論的風行。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風〉非民歌說」漸占上風，該派學人更為注重《詩經》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多從文本本身所涉及的稱謂、器物，以及作品所體現的精神風貌等方面入手，來考訂《國風》作者的身分。伴隨「〈國風〉民歌說」主導地位的破除，〈雅〉〈頌〉詩的文化價值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⁶⁵

他對20世紀國風民歌說的爭論與發展提出概略的描述，80年代以前國風民歌說幾乎是學界一致的看法。50年代起，最流行也最權威的解說稱〈國風〉是勞動人民的民歌，乃至奴隸的反抗之歌，毛澤東說是「老百姓的民歌」，主要為宣揚《詩經》的現實性與人民性。胡義成〈魯迅與詩經〉：

四人幫及其御用文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則抽象地鼓吹《詩經》是當時的民歌選，對中國詩的現實主義方向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⁶⁶

當時只有極少數學者提出質疑。例如：30年代朱東潤〈國風出自民間說質疑〉（1935）⁶⁷向民歌說提出挑戰，他考證〈國風〉絕大多數的作者並非出自民間，《詩經》不是民歌總集，可惜未獲學界展開討論。五、六十年代，也只有胡念貽〈關於詩經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1959）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出了反思，他指出：〈周南〉11篇中有6篇、〈召南〉14篇中有8篇可以肯定不是下層人民的作品；〈小雅〉和〈國風〉中的怨刺詩也很難確定是屬於勞動人民的作品；〈七月〉也不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而出於統治階級的詩人。他認為《詩經》中大部份的詩是群眾性的創作，不能說是民歌。其作者有的是貴族，有的是一般知識分子，也有的是下層的勞動人民，其中以一般知識分子居多。⁶⁸這是對庸俗社會學和偏左思潮的抗爭，

⁶⁵ 文載《中國韻文學刊》第20卷第1期（2006年3月）。

⁶⁶ 見胡義成：〈魯迅與詩經〉，《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3期。

⁶⁷ 1935年發表於《武漢大學文史季刊》後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⁶⁸ 文載《文學遺產增刊》第7輯。收入其《先秦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他所說的〈周南〉6篇非民歌是〈關雎〉、〈葛覃〉、〈卷耳〉、〈樛木〉、〈兔置〉、〈麟趾〉，〈召

但這樣的主張在當時的環境下並無法展開討論。

檀作文〈20世紀以來的國風民歌說與非民歌說之爭〉並進一步描述當時自覺和系統應用馬克思主義，強化勞動人民作品的研究現象說：

1949年以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的自覺和系統運用，是整個學術界的大勢所趨。〈國風〉中大部分詩篇尤其是優秀作品出自勞動人民之手的觀點，被空前強化。余冠英《詩經選前言》（1956）說：《詩經》大部分是各地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的制作。〈國風〉和〈小雅〉，尤其其中的民歌、民謠是其精華。這些民歌、民謠直接道出了人民的勞苦和幸福、所受的損害與侮辱、以及反抗和鬥爭。高亨更在《詩經引論》（1956）裏，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將《詩經》的作品分為「勞動人民的詩歌」（〈國風〉）和「地主階級的詩歌」（〈雅〉、〈頌〉）兩大類。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63）認為：〈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鮮明的畫面，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處境，表達了他們對剝削、壓迫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國最早的現實主義詩篇。社科院文研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對《詩經》的認識和評價，基本與此相同。這兩套《中國文學史》作為通用教材在全國發行，在高等教育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余冠英的《詩經選》和高亨的《詩經新注》，以及兩套《中國文學史》的廣泛流行，使得「〈國風〉民歌說」幾成共識。⁶⁹

〈國風〉民歌說成了當時的共識，人民性與現實性成為評價詩篇的標準。1950年郭沫若在《文藝報》上發表〈簡單的談談詩經〉，提綱挈領對《詩經》的藝術性加以總結。他認為最有文學價值的是〈國風〉，因為它保留著民歌民謠樸素的人民風味，有自然和生動的情趣，口語的形態，整齊諧適的音韻；〈國風〉多是一些抒情小調，調子相當簡單，喜歡用重覆的辭句反覆詠嘆。他又指出〈國風〉敘事的成份很少，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成份，沒有什麼悲壯的成份。〈雅〉、〈頌〉是宗廟朝廷的貴族文學，〈周頌〉好些是斷片的東西，…拿文學價值來說，卻是最無聊的，含有詛咒的一部份變雅尚可取。他並在結論說：

作為今天在寫作上的借鑑，如果是技術上的問題，《詩經》是太古遠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問題，那倒還有很可以供我們借鑑的地方，首先告訴我們民間文藝的生命，比貴族文藝或宮庭文藝的生命更豐富，更活潑。……偉大的文藝作品必須由民間文藝的加工。⁷⁰

從中看到他對《詩經》寫作技巧的忽視，只推崇〈國風〉的民歌價值，甚至變雅中對施政者

南〉8篇非民歌是〈鵲巢〉、〈采芣〉、〈采蘋〉、〈甘棠〉、〈羔羊〉、〈小星〉、〈何彼穠矣〉、〈騶虞〉。

⁶⁹ 文載《中國韻文學刊》第20卷第1期（2006年3月）。

⁷⁰ 原載1950年《文藝報》，後收入《郭沫若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的詛咒，並粗率的說雅頌是無聊的宗廟貴族文學。高亨在〈詩經引論〉中也說：

阿諛上級領主，如小雅天保，南山有臺，大雅假樂…等篇，這種詩歌不僅沒有什麼進步意義，而且往往誇大虛偽，失去應有的真實性，做為史料，不無問題，是三百篇中最要不得的一部份。⁷¹

他們把民歌視為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反映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和鬥爭，具有人民性、階級性，因而將五四以來的民歌觀念，往前推向階級對立與鬥爭的狹隘死角。比比可見直覺臆測，千奇百怪的解詩現象。論者努力從〈國風〉中尋找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內容，引伸為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像高亨〈詩經引論〉就是典型的代表，他說〈候人〉是領主霸占農民的女兒又將她拋棄、〈防有鵲巢〉是領主弄走農民的愛妻、〈月出〉是領主殺害農民…⁷²，在這樣政治干擾學術的環境下，強化文藝的社會分析，庸俗社會學制約著學術研究。

四、人民性與階級對立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 2 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說：「迄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是處於互相對抗的地位，進行著不斷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若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馬克斯階級鬥爭論提出階級鬥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消滅，把階級鬥爭視為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毛澤東論文藝》也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階級社會，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⁷³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問題更加凸顯，消滅資產階級是中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學習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成為社會高喊的口號，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所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⁷⁴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等政治口號的喧騰下，於是論者紛紛把《詩經》視為是一部具有強烈階級性的作品，是古代勞動人民揭露奴隸制社會的階級矛盾，控訴奴隸主罪惡的，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民性的作品，應從階級的立場讀詩，批判傳統詩教『溫柔敦厚』、『思無邪』。⁷⁵

⁷¹ 見高亨〈詩經引論〉，原載《文史哲》1956 年第 5 期，收入《詩經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頁 1-29。

⁷² 同前註。

⁷³ 見《毛澤東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 年），頁 64。

⁷⁴ 見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 年 6 月，《列寧選集》第 4 卷，頁 11。

⁷⁵ 寇淑慧《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收入不少這類文章，例如詹安泰〈詩經裏所表現的人民性和現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思想上之反映》所舉《詩經》篇章，純從社會變動與階級對立觀點加以分析，並放大其社會變革、衝突之特點。高亨的〈詩經引論〉尤其是一篇有影響性的文章，他對《詩經》的基本態度為在階級社會裏，沒有一篇作品不打上階級烙印，不過烙印有的明顯，有的隱晦而已。基於此觀點，他認為研究《詩經》必須考察作者的階級和作品的階級性。在結語中他說：

……我們從兩個階級的作品中，看到了領主階級，尤其是大領主們怎樣剝削人，怎樣過著享樂的生活，怎樣驕歌淫舞，縱欲狂歡；也看到了農民階級怎樣受剝削，怎樣受壓迫，怎樣過著苦難的生活…請看今天，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三十年的艱苦英勇的鬥爭，已經摧碎了封建主義的枷鎖，同時斬斷了帝國主義的魔沼，掃滅了官僚資本主義的吸血鬼影……⁷⁶

高亨將唯物史觀的方法具體運用到《詩經》篇章的解讀，發揚《三百篇》的社會意義意識形態展露無遺。據張海峰〈論高亨的詩經研究〉統計高亨《詩經今注》所作的題解中「農奴主」、「農奴」、「統治階級」、「被剝削階級」等字詞普遍出現，涉及階級分析的詩篇有42篇之多。⁷⁷又據左洪濤〈論高亨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統計高亨僅僅在〈國風〉部份就有三十五篇是屬於本來沒有階級性或階級性不強的作品，卻被高亨貼上了階級標籤，附上了政治內容。⁷⁸陳子展《詩經直解》於〈小星〉詩說：「當是小臣行役自傷勞苦之詩。古奴隸社會『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左傳》）」⁷⁹袁梅《詩經譯注》說周人在太王古公亶父的帶領下由邠遷居岐山周原，整頓部落組織，規劃土地，設置官吏，開始由原始公社跨入階級社會—奴隸制社會。至周平王東遷（西元前770年）以後，社會生活逐漸變化，在春秋、戰國大約五個世紀內，逐步由奴隸社會發展演變到封建社會。西周王朝在殷王朝奴隸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奴隸制經濟和政治制度，成為我國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代。西周的社會階級結構類似商代，主要是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還有介乎這二者之間的平民階級。⁸⁰論者如此強調階級，試圖探究詩中的階級矛盾，主要由於階級矛盾是奴隸社會一切矛盾的核心，而反剝削，反壓迫又是階級矛盾最基本內容。宋萌榮等著《當代視閥下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分

實主義精神》，《人民文學》1953年7、8期合刊、鄧潭洲〈詩經中的現實性和人民性〉，《文史哲》1955年10期、聶石樵〈論詩經的人民性〉，《文學遺產增刊》4輯，1957年3月、李松筠〈論詩經所反映的階級內容〉，《河北師院學報》1979年4期、復旦大學中文系先秦文學組〈劉大杰抹殺詩經的階級性〉，《學術月刊》1958年12期。

⁷⁶ 見高亨《詩經引論》，原載1956年第5期《文史哲》，收入《詩經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28-29。

⁷⁷ 文載《東岳論叢》第32卷2期（2011年2月）。

⁷⁸ 文載《中國文化月刊》245期（2000年8月）。

⁷⁹ 見陳子展：《詩經直解》（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58。

⁸⁰ 見袁梅：《詩經譯注》（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8-9。

析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說：儘管也有許多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分，但從1956年以後向「左」的方向的發展中，可以看出貫穿其中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平均主義，一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前者是追求的目標，後者是實現目標的手段。⁸¹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是要完全消滅了階級和剝削，消滅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迫使人們奴隸般的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勞動已經從謀生的手段變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唯階級是議，幾乎是當時讀《詩》的共識，於是不管傳統注疏、詞義訓解、詩境描寫，論者都可以簡單的比附，加上想像情境，完成對《詩經》解讀的階級描繪。

劉堯民〈周代的民間詩歌—國風及其他〉說：

假如不站在人民的立場以階級觀點來看〈七月〉便看不見它的嚴重性……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陸侃如的《詩史》把〈七月〉的詩刻畫成一幅田家樂，欣賞這詩『帶著農業的地方色彩』（重印本《詩史》）⁸²

以階級觀點讀《詩》，才能掌握人民性、階級性是當時讀《詩》的準則，不以此思維方式即將受到批判，因此使得《詩經》的詮釋更加模式化。郭沫若以為〈豳風·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奴隸主對女奴享有初夜權的鐵證。高亨〈詩經引論〉以為是領主硬把農民的女兒拉到他家裏去。⁸³新中國成立以來，多數學者以為〈七月〉的作者為農夫或農奴，為他們生活的血淚控訴。只有胡念貽〈關於詩經大部份是否民歌的問題〉否認此詩作者為農民，並持不同觀點說：

這裏寫的是一片融洽景象。『女心傷悲』，其實只是像〈小雅〉、〈杕杜〉詩裏的「女心傷止」，「女心悲止」一樣，不過那裏是表示懷人之情，這裏是表示思春而已。采桑的女子，不一定屬於被統治階級，前面我們提到貴族女子也有采桑、采繁之事。詩裏寫「公子」，並無仇恨懼怕之情。下面還有「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之句，也表現了一種融洽的感情。如果那兩句真是照一些研究者的那樣解釋，而這首詩又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那麼所表現出來的感情應該是這樣的嗎？⁸⁴

胡氏以為本詩作者不一定是被統治階級，還分析詩中人物的情感表現，向國風民歌說提出質疑，像這樣從文學作品內在本質研究的清新之見，在當時並未得到回應。學者一窩蜂的從一首短詩中論其階級意識、階級感情，以強化其矛盾鬥爭。

⁸¹ 見宋萌榮等著：《當代視閥下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97。

⁸² 見劉堯民：〈周代的民間詩歌—國風及其他〉，原載《雲南大學學報》1958年1期，收入《詩經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79-132。

⁸³ 見高亨〈詩經引論〉頁16，高氏還提及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三篇第一章、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第二卷164頁、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289頁，三位先生都這樣解釋，是正確的。

⁸⁴ 見胡念貽：〈關於詩經大部份是否民歌的問題〉，《文學遺產增刊》七輯（1959年12月），頁1-13。

高亨《詩經今注》以〈陳風·月出〉為「反映領主殺害農民的一件事實。」將一首月下懷人的戀歌說成：「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凶暴殘忍，反映出被壓迫的人們的犧牲流血，充滿著作者的悲悼情緒，而這種本質是對統治者的強烈憎恨。」進而他又形象的描繪本詩的情境說：「在月光慘白之下，一位英俊的人兒身上五花大綁走進殺人場，鋼刀一舉，人頭落地，火光一起，屍首成灰。殺人場旁的老橡樹，枝幹盤曲，被風吹動，吼叫顫搖，增加了陰森氣象，作者們的心靈在悲苦，在跳動，在傷悼。」高亨為何要把這位被殺害者視為「被壓迫的人們」，而那位殺人的人就是「封建領主」？他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和哀公十一年兩次所謂「勞動人民起義」作證⁸⁵，這純為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必須對文學作品進行階級分析的原則，其實這首詩和《左傳》所載並無必然關聯，況且高亨故事性的想像詮釋法和詩中詞義、情境多有矛盾。〈齊風·東方未明〉余冠英《詩經選》：「這首詩寫勞苦的人民為了當官差、應徭役，早晚都不得休息。監工的人瞪目，一刻都不放鬆。」高亨《詩經今注》則進一步指出：「這是一首農奴們唱出的歌，敘述他們給奴隸主服徭役的情況。」儘管兩人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的理解各不相同。《辭海》文學分冊〈東方未明〉條目也說：「現代研究者或認為是反映奴隸的繁重勞動。」

社會主義強調社會階級分析的觀點，全面性而且長遠影響中國大陸學界的《詩經》詮釋，80年代以後受到推崇的袁梅《詩經譯注》一書即充斥階級對立觀點詮詩。他詮解〈秦風·權輿〉說：「這是古代大奴隸主的一個舊僚，換了新主子，受到冷遇，心懷不滿，他懷念舊主子，便唱歌表達內心感觸，從中看出奴隸主階級內部的矛盾。」詮解〈周南·汝墳〉說：「這是古代勞動婦女思念被奴隸主階級遠役的丈夫而唱的歌。一面苦苦懷念遠行的丈夫；一面控訴『如燬』的奴隸制度。」詮解〈邶風·北風〉說：「一群被剝削壓迫的奴隸，受不了重重壓榨，想和共命運而互相關懷愛護的朋友相率離去，別謀生活。」在引述《毛詩序》之後，又說：「古代確有奴隸相率逃亡之事。」詮解〈豳風·七月〉說「是周代的農業奴隸集體創作的一首長詩，描述了奴隸們全年艱苦勞動過程和生活慘狀，揭示了奴隸制社會中的階級矛盾。」詮解〈小雅·北山〉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反映奴隸主貴族土地國有制。周王把井田分封給諸侯與百官，各級奴隸主貴族又將得到的井田分配給自己的奴隸集體耕作以榨取奴隸的血汗，並且還強迫奴隸們服各種力役；戰時，又征調他們去當兵打仗。奴隸們經年累月地進行艱辛的勞作，推動著西周的農業、手工業不斷向前發展。農業奴隸和手工業奴隸，從生產勞動實踐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了更多的社會財富。但是，他們的血汗結晶——勞動果實，卻被奴隸主貴族劫奪一空。奴隸主貴族搜刮的

⁸⁵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周靈王 22 年，550B.C）：「……陳侯圍陳，陳人城，隊而殺人，役夫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寫陳國築城役夫因挾板落於城下，慶氏便殺了役夫，人民不堪忍受慶氏的專制暴虐，而殺死慶虎、慶寅。《左傳·哀公十一年》（周敬王 36 年，484B.C.）寫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以及國家賦稅課徵應厚施薄取，以周公所制賦稅制度為依據。兩年史事和〈陳風·月出〉毫無關連。

糧食，堆積如山；而奴隸們卻無衣無食，饑寒交迫」。⁸⁶張啟成、傅星星《詩經風雅頌論稿初編·論魏風》說：

魏國是一個交通閉塞、長期閉關自守的國家，因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非常緩慢。至今的出土文物證明，直到東周初年，古魏國一帶，不僅沒有鐵器，甚至連青銅器的使用也不那麼普遍。由於生產工具的落後，土地貧瘠，自然災害比較嚴重，農業的產量很低；又由於秦、晉兩個大國的脅迫，人民需要負擔大量的軍餉、賦稅，並從事於軍役與勞役；再加上魏國統治者的昏庸無能，奴隸主的殘酷剝削，因而魏國人民的生活特別貧窮，遭受的壓迫特別慘重。但是有壓迫就必然有反壓迫的鬥爭，所以很自然地產生了像〈伐檀〉、〈碩鼠〉那樣「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詩歌。詩人忿怒地斥責道：「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奴隸主不勞而獲的醜態本質。……⁸⁷

以馬克思唯物史觀，從生產工具、生產力、外患、內政分析魏國人民的生活實況，或有可取之處，但將周代定位為奴隸社會，一味將詩視為奴隸社會奴隸主剝削奴隸，這樣單一機械化的詮詩操作模式，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下的詮詩延續。

總之新中國成立後，肯定怨刺詩為《詩經》的精華，將〈伐檀〉、〈碩鼠〉、〈黃鳥〉、〈鴛羽〉、〈陟岵〉之類的詩選入教材，極力宣傳具有階級矛盾、暴露統治階級殘暴、腐朽和具有反抗精神的詩篇，從這類詩篇對現實生活的描寫，呈現不同階級的人在現實生活的感受，以展開人民性與階級對立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周代政治社會彷彿充斥著階級矛盾，一部《詩經》好像是在揭露奴隸主對奴隸的壓迫，奴隸痛苦的哀號與控訴，揭露奴隸制度的罪惡本質，人民對奴隸主階級的仇恨與鬥爭，以及對他們的蔑視與諷刺，人民具有不屈從的頑強抵抗力，全面肯定《詩經》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與現實意義。為了滿足唯物史觀的階級學說，從文藝社會學的層面上闡釋文學作品的特性，《詩經》詮釋被引入簡單庸俗化，淪為階級鬥爭工具的命運。

五、文革時期愈演愈烈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十二條規定：「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理論。「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口號流行，並導致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年輕時自比康有為、梁啟超，1966年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以

⁸⁶ 見袁梅：《詩經譯注》，頁9-10。

⁸⁷ 張啟成、傅星星：《詩經風雅頌論稿初編·論魏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頁162。

康梁為藉口，猶如他淺薄表層的引用馬克斯主義，批林批孔，以階級鬥爭，暴力的方式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消滅一切文化。

繼 1958-1960 大躍進之後，60-70 年代文革時期，許多《詩經》研究議題無法展開討論，學者下放勞動，變本加厲的將《詩經》用為鼓吹階級鬥爭的工具，1966 年文革時甚至在「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下，將它說為「奴隸主貴族文學」，被列入破四舊之中。《詩經》連同其他絕大部份的古今中外經典都被貼上「封、資、修」的標籤，非禁即毀。當時盛行年青學生集體批判經典，如開封師院中文系學生所撰〈試論國風的政治傾向〉：

……國風所宣傳的種種沒落階級意識形態，對於革命的破壞作用甚至比有形的武裝鎮壓更大。正因此，先秦法家及歷代革命人民無不對它深惡痛絕。商鞅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秦始皇進而把詩書付之一炬，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軍更把《詩經》在內的四書、五經一概稱為『妖書』……。⁸⁸

所謂唯物史觀，竟是草率的借鑑歷史，高喊著批林批孔的政治口號。高亨〈孔子是怎樣維護奴隸統治的〉⁸⁹、劉蔚華〈孔丘—儒家唯心主義哲學的鼻祖〉⁹⁰李嘉言〈關於詩經的一些問題及其中封建教化觀點的分析批判〉⁹¹、唐再興、鄭乃鍼〈為反革命復辟服務的文學觀—剖析孔丘詩教的反動性質〉⁹²、任重遠〈文學是戰鬥的！斥溫柔敦厚的孔門詩教〉⁹³、任炳、黎生〈孔老二克己復禮的文藝標準〉⁹⁴之類論著對孔子與傳統文化展開強烈的抨擊。金實秋、蕭維琪〈評詩經的政治傾向〉說四人幫和有些人辱罵《詩經》是「復辟經」，「是奴隸主貴族的文學」，批判《國風》「主要反映沒落奴隸主的思想感情，貫穿著一條復辟倒退的黑線」。《詩經》是反動階級的儒家工具，是奴隸主貴族的文學，沒有什麼進步意識可言，表現了十足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想。⁹⁵文革期間，在嚴酷的文化專制政策下，有的只是類似的鬥爭性文章及論點。

夏傳才說文革十年沒有出版一本研究《詩經》的書，文章只有幾篇：〈被壓迫奴隸的嘹亮戰歌—讀伐檀鼠頤〉、〈奴隸反抗的呼聲不容抹煞〉、〈奴隸社會的詩歌〉、〈劉大杰抹

⁸⁸ 見開封塑料場工人理論組，開封師院中文系七二級六班撰〈試論國風的政治傾向〉，《開封師院學報》1975 年 2 期。

⁸⁹ 文載《文史哲季刊》1973 年 1 期。

⁹⁰ 文載《文史哲季刊》1973 年 4 期。

⁹¹ 文載《語文教育通訊》1957 年 7 期。

⁹² 文載《南京師院學報》1974 年 1 期。

⁹³ 文載《浙江日報》1974 年 2 月 3 日。

⁹⁴ 文載《北京文藝》1974 年 4 期。

⁹⁵ 文載《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77 年第 4 期。

煞詩經的階級性〉、〈試論國風的政治傾向〉、〈在詩經問題上的儒法鬥爭〉⁹⁶韓明安《詩經研究概觀》也說：

文革十年，批儒評法、橫掃四舊，使詩經研究重遭秦火，我們在搜集詩經研究資料時，獨不見秦代和文革時期的成果。從 1966 到 1976 的十年中，國內報刊上未見一篇對具體詩篇的研究文章，僅存十幾篇關於《詩經》整體問題的批判文學，乃是為了配合「批林批孔」匆匆寫就的，顯然是算不得研究成果的。⁹⁷

十年文革摧殘，經書已被批判得體無完膚。林祥徵〈二十世紀中國詩經研究述略〉說：

1957 年-1977 年：《詩經》研究的低潮期。從反右派開始，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在不間斷的批判中，遭受到極大的傷害，被視為「復辟經」的《詩經》也遭到空前的厄運。〈剖析孔丘詩教的反動性質〉、〈思無邪是什麼貨色？〉、〈為反革命復辟服務的文學觀—剖析孔丘詩教的反動實質〉等討伐式的論文充斥於報刊雜誌。寫這種棍棒式批判文章的大多是年輕的中文系學生，並以集體名義發表，而許多正當盛年的學者只能虛度年華，實在令人痛心。另一方面，庸俗社會學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傾向，它把「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運用於研究之中，把各式各樣生活政治化，把複雜的多形態的作品作簡單的階級劃分，有利於階級鬥爭的就是好作品，反之就是封建糟粕。〈陳風·月出〉本是一首優美的愛情詩，卻被解釋為「描寫統治者殺害青年的哀歌」。⁹⁸〈召南·殷其雷〉本是一首描寫婦女思念丈夫的詩，卻被解釋為「奴隸逃亡之歌」⁹⁹，這種毫無情趣的穿鑿附會，實質上取消了《詩經》藝術的獨特品味。那時人們不敢講《詩經》的藝術，誰講就扣上「唯美主義」、「藝術至上」的帽子。¹⁰⁰

當時的情況是學者受到迫害，青年學生群體以批鬥為職志。毛澤東思想泯滅人性，否定個性，簡單化、庸俗化和實用主義，帶來一場十年文化浩劫。直到80年代開始撥亂反正，克服過左思潮的影響，清除《詩經》是奴隸反抗之歌等怪論，《詩經》的解釋才逐漸走出這場惡夢。

肆、庸俗社會學對《詩經》研究的扭曲

《詩經》為我國典籍中性質最為獨特的一部經典，不僅是文學作品，又是研究上古社

⁹⁶ 見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頁 188。

⁹⁷ 見韓明安：《詩經研究概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頁 22。

⁹⁸ 撰者按：高亨《詩經今注》：「陳國的貴族，殺害了一位英俊人物。作者目睹這幕慘劇，唱出這首短歌，來哀悼被害者。」（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184。）

⁹⁹ 撰者按：見鮑昌：《風詩名篇新解》（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年），頁 35-40。

¹⁰⁰ 林祥徵：〈二十世紀中國詩經研究述略〉，《泰安師專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1999 年 3 月）。

會、歷史、語言的重要材料，匯萃儒家思想精華，從漢代以來還是一部倫理道德教化的教科書，存在許多疑難和複雜的詮釋。五十年代以來，由於過於強調文學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只肯定《詩經》中的怨刺性質民歌，而對雅、頌中的大部份作品避而不談，或加以否定。庸俗社會學以新經學代替舊經學，把研究導入歧途。文革時期《詩經》被稱為「奴隸主貴族文學」，流傳的只有幾首詩篇。新時期撥亂反正，學者紛紛檢討這段期間的問題，以為前進的借鑑。¹⁰¹

上文從社會制度的論辯、歷史唯物史觀、國風民歌說、人民性與階級性幾個實不可分的面向，分別論述上世紀 50-70 年代受到毛澤東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影響，於《詩經》研究所呈現的一些現象，進而到文革期間瘋狂式的摧毀傳統文化，對《詩經》研究造成嚴重的扭曲，主要由於思維與研究方法的偏失，試就以下四項論述之：

一、硬套西方歷史發展框架

論者硬套馬克思人類歷史發展的五階段於中國社會，認為中國也曾經有過奴隸社會。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西周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時代相當，孫作雲說西周有類似歐洲的農奴制，金啟華則以奴隸創造希臘文化，類比於周代燦爛文化也是建立在廣大奴隸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解讀詩篇必先確立階級，探討其生活形態，忽視《詩經》的經學、文學特色，學者一味的以《詩經》為社會史材料，不經嚴謹考證，即推測詩中所呈現的生產工具與社會生活形態。於是在《詩經》的解釋中時見斯大林對奴隸社會的描述情景：「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¹⁰²這樣的基本觀點。

此階段學者粗糙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探討周代社會制度，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無疑是受到毛澤東思想，以及當時政治、社會背景所制約。

二、研究方法、方向單一

新中國成立後學者開始比較自覺的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研究一切學術，又受到

¹⁰¹ 例如：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54 年新版〈引言〉中坦率自我批評說：「主要由於材料的時代性未能劃分清楚，卻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高亨晚年對自己五十年代的研究作了一些修正，如〈王風·君子于役〉和〈周南·漢廣〉篇的解釋就拋棄了當年略重強調階級性的一面。夏傳才對自己文革期間所撰《詩經研究史概要》作了一些修正，並在《二十世紀詩經學》指出該階段《詩經》研究的三點失誤：1. 批判唯心論是資產階級思想，宣佈純學術觀點是資產階級的“白磚道路”，…還公開宣佈“政治標準”第一。2. 庸俗社會學的滋生，按照蘇聯移植過來的文藝理論，以黨性、人民性、現實主義作為對文藝作品的取捨原則，以貫徹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作為政治標準來分析作品。3. 學術上的過左思潮又與政治運動結合，對學者進行人身迫害。…發展到「文化革命」，《詩經》被定性為“奴隸主貴族文學”。（見該書頁 183-185）

¹⁰² 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主義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頁 712。

極左思潮的干擾，唯物史觀決定一切，文學作品以反映階級矛盾，具有社會價值為標準，思想陳腐教條，把〈國風〉視為群眾性口頭創作的民歌，肯定其階級對立的社會意義，推崇其價值，而將〈雅〉、〈頌〉視為腐朽的貴族文學。千篇一律以唯物史觀、民歌、階級對立為研究方法，研究方向只注意人民性，社會性，忽視內心情感、文化精神、文藝審美，《詩經》研究被簡單化為政治運動的工具，削弱其學術性與藝術性。

列寧曾說：「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¹⁰³馬列主義並未忽視唯心主義可以彌補唯物主義之失，但在唯物史觀左右一切的思維下，像〈邶風·七月〉這樣吟詠一年間的農事詩，或許只是描述氏族領導下的農村生活，「我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之句，是不能解釋為農村姑娘想到自己即將嫁給公子離開母家的思春之作，「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是不能解釋為對公子關愛之情的，若作這樣的解釋就是中了封建餘毒太深。唯物史觀學者郭沫若說「女子恐為公子強暴欺凌」、高亨說「領主硬把農民的女兒拉到他家裏去」、翦伯贊說「推測可能是領主對所轄女子有初夜權」（孫作雲也有類似說法），當時〈國風〉中社會性強的詩篇，幾乎都被烙上階級對立的印記。高亨說〈周南·漢廣〉是農奴或奴隸所作，作者愛上莊園主的女兒，由於階級的限制，不得相戀，莊園主的女兒終究嫁了別個貴族。¹⁰⁴說〈鄘風·柏舟〉當是農民的女兒所作，作者愛上一位少年，而她的母親硬逼她出嫁旁人，她誓死不肯。¹⁰⁵先確立詩篇作者的階級，然後從詩的文字臆想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令人覺得似乎其因只有階級，用以凸顯階級對立是社會主要問題。當時論者幾乎都抱持唯階級的觀點，機械式的套用解說詩篇。像這樣的研究是用一些歷史的框架和一些理論的標籤貼在作品上，僅求滿足於一般概括性的東西，摧毀〈國風〉生動活潑的其他面向。這樣簡單的讀《詩》法形成風氣，不僅無益於詩義的理解，而且也流失《詩經》的文學特質。

雅詩中的宴饗詩所受抨擊最為強烈，60-70年代流傳最廣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說：「在這些詩裏，反映出奴隸主貴族們宴會享樂的奢侈生活，在他們這種通宵達旦的吃喝玩樂的背後，不知隱藏著多少奴隸的醜行。」1979年北京大學游國恩等合編的《中國文學史》對〈賓之初筵〉詩所描寫的貴族們醉後的醜態畢露，分析說：「不管作者創作意圖如何，客觀上正好暴露了他們的放肆和虛偽。」像這些大學教科書只承認宴飲詩在客觀上反映了「剝削階級的荒淫腐朽生活」，這樣的態度並未能掌握宴飲詩中所展現的周文化精神，以及和諧的人際關係。

過於偏向文藝社會分析的結果使得《詩》的文化與審美被忽視。把唯物主義視同以階級鬥爭為綱，必然走入庸俗社會學。恩格斯曾尖銳批評這樣的錯誤說：「首先我必須說明：如

¹⁰³ 見《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305。

¹⁰⁴ 見《詩經引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詩經研究論文集》），頁26。

¹⁰⁵ 見《詩經引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詩經研究論文集》），頁26。

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麼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¹⁰⁶他對唯物史觀研究易流於框架式、標籤式套用提出的警告，不幸竟成為中國很長時期《詩經》研究必須藉強調對立才能建構的論述架構。

三、意識形態凌駕學術

此階段以唯物、階級、社會價值取向為解《詩》標準，在特定的政治立場下預設研究前題，忽視學術研究，浮躁成風。像王迺揚〈讀高亨先生詩經引論〉指出高亨過於從階級立場說詩，缺乏實事求是精神，其中不少意見是相當客觀具體，一針見血指出高亨不顧字詞訓解，預設情境，從階級出發解詩的荒謬。例如他說肯定〈王風·兔爰〉為沒落領主「回憶以往寄生生活」的作品，是比較勉強的。「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這確是在作今昔對比。正因為是今昔對比，所以由於「逢此百罹」可以推斷「尚無為」正是與之相對的天下無甚亂事，也就是「天下升平」的意思，而不是「不勞動而坐獲享受」的意思。他同意李長之先生的看法，這首詩「表現了西周遺民的極大悲痛。」（中國文學史略稿一卷三四頁）。……說讀〈陳風·月出〉我們只能意識到一個戀人在皎潔的月光底下懷戀著意中人的美，根本看不到一位「身被五花大綁」的「英雄的人民」被殺死。¹⁰⁷誰知這樣平實的看法，高亨竟然不能接受，寫一篇〈給文史哲編委會的信〉答辨¹⁰⁸，他說無為、無造、無庸是無所事事，不工作、不勞動，絕不是無變亂、無戰爭，還批評王迺揚離開語法、字義講古書。「為」（為是一個萬能動詞，取義應視語境而定）、「造」、「庸」詞義雖有勞動之意，但放在詩句中，連及下文今昔處境對比，詞義必須引申。王氏之見確實要比高亨說沒落領主感嘆以前不須勞動，現在卻遇災難，合於詩義。因為「百罹」（各種災難）實不像是說領主沒落，「尚寐無吽」（長睡不醒）更不可能是沒落領主會選擇的生活態度。至於〈月出〉高亨將「劉」、「療」形容佼人美好的形容詞，換成動詞性的通假字「劉」、「療」，釋為殺、捆綁，將一首充滿浪漫情懷月下懷念美人的詩，說成一幕血腥恐怖的畫面，這樣的解釋，無疑是受到奴隸社會下奴隸主可以任意屠殺奴隸的影響。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將厲王暴虐，國人起義，流王於彘這件事，說是農奴起義。他據《國語》所載厲王寵任榮夷公，而榮夷公好「專利」，加重對農民的剝削。什麼是「專利」？他又據《大雅·桑柔》尤其是「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幾句，解釋為在剝削力役地租以外，又剝削農奴份地裏的收穫物。把力民解為「田畯」，是領主的鷹犬，農奴的頂頭上司。」「他們大肆搜括，大張其凶焰。」把「代食」解為「代蝕」，蝕就是剝削，搜括糧食。他根據此詩，得出結論說：以周厲王為首的領主，「好是稼穡」，搜

¹⁰⁶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409。

¹⁰⁷ 王文原載《文史哲》1956年第9期。收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詩經研究論文集》。

¹⁰⁸ 文章原載《文史哲》1956年9期。收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詩經研究論文集》。

括糧食，他們把農民的糧食，像寶貝一樣地都搜括去了，這就是引起這次大起義的原因。他又根據《國語》引太子晉說「厲始革典」，解釋說所謂革典就是不按照這種（領主制）土地制度所規定的，在領主剝削力役地租時，不得再剝削農奴份地裏的收穫物，因厲王破壞這種舊法，剝削農奴份地裏的收穫物，故謂之「厲始革典」。孫氏的說法顯然不夠嚴謹。「力民」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說法是斂民之賦稅。誰聚斂呢？就詩意看是周厲王，不可能是田峻。「代食」也不能釋為「代蝕」，任意換字，釋為剝削。即便詩義可以如孫氏訓解，他的說法應是根據《魯詩》：「昔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¹⁰⁹但據詩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之語，判定此詩寫作時間應在厲王流亡，共和攝政時，不可能指其施政好專利之事，好專利也未必指稼穡。¹¹⁰

除了不顧字詞訓解，任意改字之外，亦時見曲解比興情事。像高亨《詩經今注》說蠡斯是剝削者，而將〈周南·蠡斯〉說為「勞動人民諷刺剝削者的短歌」、委蛇是吸食人民血液以自肥的毒蛇，而將〈召南·羔羊〉說為「衙門中的官吏都是剝削壓迫、凌踐殘害人民，蟠在人民身上、吸食人民血液以自肥的毒蛇……」、狐狸也是剝削者，而將〈衛風·有狐〉說為「貧苦的婦人看到剝削者穿著華貴的衣裳，在水邊逍遙散步，而自己的丈夫光著身子在田野勞動……」以剝削對立的態度解《詩》並非偶見。¹¹¹其他任意改換主語，設想情境，這樣或那樣奇形怪狀的訓解方式不一而足，已無暇細論。

總體而言當時解《詩》模式，完全遵循意識形態規範，在預設的結論下，曲解詞義，隨意引詩證史，或引詩為階級鬥爭之用，並無學術真理可言。

四、漠視文學與文化

馬列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裏，社會現實就是階級鬥爭的現實。因此《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不能不體現階級鬥爭。文學作品永遠有傾向性，所謂「超階級」、「純藝術」、「人性論」被斥為騙人的技倆。這樣的思維方式與臺灣絕然不同。國父孫中山說：「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他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他在《孫文學說》中也說：「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該階段由於強調階級性，以為政治革命的思維工具，因而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和諧關係。

¹⁰⁹ 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941。

¹¹⁰ 屈萬里《詩經詮釋》、程俊英《詩經注析》對此都有解說可參。

¹¹¹ 〈蠡斯〉一詩以蝗蟲之多子，用以祝頌人家子孫眾多。委蛇為聯綿詞，形無定寫，《韓詩》作逶迤，狀召南大夫行路紆曲從容貌。「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見狐緩步獨行淇梁，心憂之子無裳。詩之語境固難確知，但有狐與之子未必定要說成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不可。

不容否認《詩經》是我國最早最優美的文學作品，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詩經》條中提出：「故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品讀，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賞玩之，則詩之真價值乃見也。」胡適〈談談詩經〉亦主張用「文學的眼光讀詩」，他們的論點一掃傳統舊注以倫理道德說詩，而此階段又導入另外形式的政治社會說詩。像郭沫若以唯物史觀，從《詩經》產生時代經濟狀況分析，認為《詩經》中有些戀愛詩反映了當時在商業貨幣發展下的情況，〈鄭風·出其東門〉出現了類於現代「摩登女兒」（職業賣淫者），〈陳風·東門之粉〉出現了類於以色相舞姿生涯的現象。¹¹²郭氏解詩頗為新穎，一掃舊說，頗具現代感。然而他並未提出有力的證據。這樣隨興的解詩，把美好的男女戀愛描寫，說成是賣淫、舞女之類的商業行為，透過簡短詩篇，臆測寫作背後的商業經濟、社會生活，失之輕率，也錯失了對《詩經》的文學美、人物性情美的品味。

《詩經》也是最具有倫理情味之作，有夫妻間的相親相愛、有對父母的尊敬、有對兄弟的關心、有對朋友的忠信、有對家族的依戀、有對國家的忠誠、也有家族觀念，這些構成我國的文化傳統。然而在只有〈國風〉中能被引用為階級鬥爭工具的詩，才具有價值的思維下，〈雅〉、〈頌〉被批為封建糟粕，許多闡揚我國文化精神的詩篇是被掩蓋的，尤其是在摧毀一切的文革十年期間。

伍、結語

上世紀 50-70 年代新中國時期由於特殊的統治思想，導致《詩經》研究宣揚人民性與階級對立，再加上文革十年的強烈鬥爭思想，使得《詩經》研究受到不該有的扭曲。既未能正確擷取馬克思思想精華，亦未能正確面對《詩經》實際內涵，敷淺的比附套用，浮躁的學術研究風氣，造成《詩經》學術史上的怪異現象。回顧當時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思想的統制，事過境遷，學界以包融的態度面對，實事求是客觀檢討。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進步為補償的。」經過好長一段時間，學界總算認清以唯物史觀理論研究《詩經》固然可以得出傳統《詩經》詮釋不同的成果，但以往將唯物史觀理論庸俗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過於膚淺，過於表面化，而淪為階級鬥爭工具的錯誤。

80 年代撥亂反正以後，時見一些清新的見解，帶動《詩經》研究前進。洪魯生《詩經學概論》說：「如今民歌作為『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這樣帶有明顯階級色彩的說法，已經不再使用，民歌主要作為『表述某種民間詩歌體裁的概念』來使用。」¹¹³原先只重視民歌的社會價值，批判〈雅〉、〈頌〉為歌頌享樂，粉飾太平，美化奴隸主統治之作的偏狹態度，亦逐漸鬆動，論者開始注意宴飲、祭祀詩集中反映禮樂文化的本質特徵，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自有其存在的價值。

¹¹² 參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年），頁 26。

¹¹³ 見洪魯生：《詩經學概論》（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 年），頁 75。

趙敏俐等著《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學術生產史》說過去一段時間太強調《詩經》的民歌因素，而大大地忽略了它裏面所體現的貴族文化情調和專業藝人的加工成分，因而對它的發生發展的解釋顯得軟弱無力，並提出要用馬克斯主義的藝術生產來研究中國古代歌詩。¹¹⁴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免除社會分析型研究模式只注意反映社會矛盾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對於作品的文化內涵和審美特徵有更多的觀照，開拓更為多元的研究面向。

文革之後，據不完全統計，自 1978 至 1987 年的十年間，共出版《詩經》研究專著四十餘部，各報刊發表的《詩經》研究文章一千餘篇¹¹⁵，很快走出學術的陰霾。袁寶泉、陳智賢《詩經探微》（1987 年）進一步發揚朱東潤「詩經非民歌說」，否定〈伐檀〉、〈碩鼠〉等作品反映「勞動民的反抗意識」。劉毓慶《雅頌新考》（1996）則對周族和周代發展史加以深入探討。再加上八十年代以後以趙沛霖《興的源起》（1987）、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1994）從人類文化學來研究《詩經》，以及不同功能《詩經》詞典的編纂¹¹⁶，展現大陸新時期《詩經》研究多元的發展，我們樂見政治干擾學術的時代已隨風而逝。

¹¹⁴ 見趙敏俐等著：《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學術生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43。

¹¹⁵ 見韓明安、林祥徵《詩經末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 月），頁 16。

¹¹⁶ 例如向熹編《詩經詞典》、董治安主編《詩經詞典》、遲文浚主編《詩經百科詞典》、莊穆主編《詩經綜合辭典》等。

參考書目

一、古籍文獻

《毛詩傳箋》，〔漢〕毛亨傳、鄭玄箋，臺北：新興書局，1973。

《詩集傳》，〔宋〕朱熹，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詩三家義集疏》，〔清〕王先謙，臺北：明文書局，1988。

二、近人著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1959，《詩經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爾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1956，《列寧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爾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197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79，《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毛澤東著作選讀編輯委員會：1966，《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

左洪濤：2000，〈論高亨詩經今注的幾點不足〉，《中國文化月刊》245期。

史甄陶：2012，〈陳子展詩經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三次學術會議論文。

朱東潤：1980，《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岑仲勉：1957，《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呂振羽：1962，《史前期的中國社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余冠英：1979，《詩經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何茲全：1991，《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君如：1991，《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宋萌榮：2009，《當代視閥下的馬克斯主義基本理論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邱惠芬：2011，〈唯物史觀下的詩經研究〉，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辦「新中國六十年的經學研究（1950-2010）」第二次學術會議論文。

林慶彰〈民國以來經學研究〉，網址：<http://classic.litphil.sincia.edu.tw/classic/?page-id=326>

林祥徵：1987，〈談談詩經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山東大學學報》1987年2期。

林祥徵：1996，〈回顧與展望——面對二十一世紀的詩經研究〉，《泰安師專學報》1996年4期。

- 林祥徵：1999，〈二十世紀中國詩經研究述略〉，《泰安師專學報》第21卷第2期。
- 金寶秋、蕭維祺：1977，〈評詩經的政治傾向〉，《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77年第4期。
- 金啟華：1992，《詩經全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金啟華：1992，《詩經鑑賞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 范文瀾：1949，《中國通史簡編》，上海：新知書店。
- 胡念貽：1959，〈關於詩經大部份是否民歌的問題〉，《文學遺產增刊》七輯。
- 胡義成：1981，〈魯迅與詩經〉，《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3期。
- 胡義成：1981，〈郭沫若與詩經〉，《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2期。
- 胡義成：1982，〈談詩經國風中勞者階級屬性的判別問題〉，《寧夏大學學報》1982年4期。
- 洪魯生：1998，《詩經學概論》，瀋陽：遼海出版社。
- 洪謙德：2007，《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臺北：人本自然文化事業公司。
- 高亨：1956，〈詩經引論〉，《文史哲》1956年第5期。
- 高亨：1973，〈孔子是怎樣維護奴隸統治的〉，《文史哲季刊》總107期。
- 高亨：1980，《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高亨：2004，《高亨著作集林》（第十卷），北京：清華大學。
- 夏傳才：1977，〈現代詩經學的發展與展望〉，《文學遺產》1997年3期。
- 夏傳才：1985，《二十世紀詩經學》，北京：學苑出版社。
- 夏傳才：1993，《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夏傳才：1995，《思無邪齋論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夏傳才：2003，〈新中國前十七年詩經研究的得與失〉，《南陽師院學報》2003年5期。
- 袁梅：1985，《詩經譯注》，濟南：齊魯書社。
- 孫作雲：1979，《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郭沫若：1985，《郭沫若古典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沫若：2002，《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郭沫若：2005，《奴隸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陳雨蒼：1974，《毛澤東思想剖析》，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 陳子展：1992，《詩經直解》，臺北：書林出版社。
- 張錫勤：1993，《中國近代思想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張啟成、傅星星：2011，《詩經風雅頌論稿初編》，北京：學苑出版社。
- 開封塑料場工人理論組，開封師院中文系七二級六班：1975，〈試論國風的政治傾向〉，《開封師院學報》1975年2期。
- 陳水福：2009，〈馬克思主義對詩經研究的影響〉，《經學研究論叢》第16輯。

- 張海峰：2011，〈論高亨的詩經研究〉，《東岳論叢》第 32 卷第 2 期。
- 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先秦文學組：1958，〈劉大杰抹煞詩經的階級性〉，《學術月刊》1958 年 12 期。
- 程俊英：2005，《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
- 趙沛霖：1989，《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 趙沛霖：1993，〈近四十年中國大陸詩經研究概況〉，《河北師院學報》1993 年第 2 期。
- 趙沛霖：2004，〈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齊魯學刊》總 181 期。
- 趙敏俐等：2005，《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學術生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趙沛霖：2006，《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北京：學苑出版社。
- 楊東蓀：1990，《中國學術史講話》，上海：上海書店。
- 楊寬：1999，《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聞一多著，孫黨伯、袁謩正主編：1993，《聞一多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劉蔚華：1973，〈孔丘—儒家唯心主義哲學的鼻祖〉，《文史哲季刊》1973 年 4 期。
- 劉堯民：1958，〈周代的民間詩歌—國風及其他〉，原載《雲南大學學報》1958 年 1 期；收入《詩經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鄧初民：1942，《中國社會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
- 翦伯贊：1949，《中國史綱》，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
- 魯洪生：1996，〈關於國風是否民歌的討論〉，《重慶師院學報》1996 年第 2 期。
- 鮑昌：1982，《風詩名篇新解》，鄭州：中州書畫社。
- 韓明安：1988，《詩經研究概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檀作文：2000，〈20 世紀詩經研究史略〉，《天中學刊》第 15 卷 1 期。
- 檀作文：2006，〈20 世紀以來的國風民歌說與非民歌說之爭〉，《中國韻文學刊》第 20 卷第 1 期。
- 羅志田主編：2001，《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藺淑英〈近年來唯物史觀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傳播及影響研究述評〉，中國共產黨史網站，2011 年 5 月 31 日。
- 〔美〕羅斯·特里爾著、劉路新、高慶國等譯、胡為雄校：1991，（修訂本）《毛澤東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 〔美〕德里克著、翁賀凱譯：2008，《1919-1937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